

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术文库

第一辑

文心的异同

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

REWRITING CHINESE LITERATURE:
NANYANG AND CHINA

张松建◎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术文库

第一辑

文心的异同

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

REWRITING CHINESE LITERATURE
NANYANG AND CHINA

张松建◎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心的异同: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/张松建著. —北京: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3. 1

ISBN 978 - 7 - 5161 - 1954 - 9

I. ①文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现代文学—文学研究—
文集②华文文学—文学研究—新加坡—文集③华文文学—文学研究—
马来西亚—文集 IV. ①I206.6-53②I330.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03253号

出 版 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史慕鸿
责任校对 王洪强
责任印制 李 建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(邮编100720)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中文域名:中国社科网 010-64070619
发 行 部 010-84083685
门 市 部 010-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650×960 1/16
印 张 23.5
插 页 2
字 数 335千字
定 价 59.00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电话:010-6400979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松建的新著即将出版，嘱我作序。作为他的导师之一，我很乐意写上几句。

松建是我带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。1995年，他从河南大学毕业，考入原杭州大学中文系（现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），从我学世界文学和西方诗学。毕业后不久，他又辞掉已获得的教职，负笈南洋，考入新加坡国立大学，转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。博士毕业之后，他又回国进京，入清华大学，从解志熙教授读博士后，继续“现代诗的再出发”。概括地说，松建十七年的求学历程，从空间上经历了一个从北到南，自东南而向南洋，再回归中心的过程；从学业上看，则经历了一个从西学入手，返回中学，再回归本土的过程。转益多师与博采众长的结果，使得松建既有了西方诗学的理论视野，又有了传统学术的博雅和邃密。而独特的空间转换和学术转型经历，想必使他对钱锺书的名言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学北学，道术未裂”，有了更切身的体会。

松建的这本新著以《文心的异同》为题，分为两辑。第一辑是海外华语文学研究，第二辑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衡。粗粗看来，这两者的关联性似乎有点松散，但细细读过，却不难发现全书的内在脉络十分清晰，作者的学术理路一以贯之。松建努力在文学的播散中寻求恒定的文心，在理论的旅行中寻求稳固的锚地，在多变的学术潮流中寻求不变之道，在对学术“他者”的述评中寻求自我的学术定位，从中获得启示和洞见。全书开篇论述的是新马华文作家对鲁迅经典的重写，依我陋见，这是一个还未被深入研讨过的课题。松建从自己独特的学



术经历和价值立场出发，通过对大量文本的细读和史料的分析，抽丝剥茧般的把鲁迅作品在新马地区的重写史理出了一个头绪，指出鲁迅经典在海外重写的过程，就是一个延异、撒播、衍生和变异过程，但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德里达式的符号游戏，更应该视为重写者从当下的“阐释学情景”和个人成见出发，与理解对象展开的对话，它们不但创造性地丰富了鲁迅经典的原初含义，也借此揭示了发生在本土社会中的诸多文化现象，表达了离散华人和南洋作家对族裔、性别、文化与政治的严重关切。无疑，这是非常中肯的断语。它不但适用于中国文学经典在海外华人社会的“正向的”播散现象，对于“逆向的”或“双向的”播散现象，如西方文学经典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的重写或再述，也具有理论阐释力。

由鲁迅经典的播散，松建进而论述了一系列当代南洋诗人和作家的创作，试图在南洋风景、马华民族志、本土意识、孤岛遗民和记忆书写中找到一条连续的线索，进而发现中华文化习俗在热带雨林中的遗存和变异，传统中国的文心在后殖民都市中的挣扎和重生。作为一个有着从中原到南洋游学的双重经验，受过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双重学术熏陶的青年学者，松建成功地克服了居高临下的大中华心态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，努力贴近研究对象的文心，展开移情能力和换位思维，在细察南洋作家创作的基础上，借用后殖民批评、多元文化批评等理论资源，得出中肯的结论，认为“在跨国主义、离散话语、本土知识、身份认同等新兴理论背景下，南洋华文作家只有坚定地让‘热带雨林’成为自己的命运伙伴，只有利用热带雨林这个‘现代性装置’去重新幻想南洋，再造南洋，新马华文文学才有‘再出发’的机缘”。显而易见，这个论断既是符合新马华人社区的历史和现状的，也是与当下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身份认同的大趋势相一致的。

相对于第一辑的文本批评，第二辑可称为批评的批评，或研究的研究。可想而知，它的难度更大，对作者的学术素养的要求更高。书评类文章其实是很难写的，弄得不好，很容易沦为曲意逢迎之作，或滑入哗众取宠之渊，为人所不齿。而松建这一辑评



述的对象大多是当下汉语学界的名人，其中既有他的师长辈学者，也有资深的海外汉学家。说实话，在读到这一辑目录时，我是很为松建捏了一把汗的。但读完全辑后，我放心了。松建果然不负所望，无论是在材料的运用，还是语言的拿捏上，都处理得非常到位。对于资深学者的论著，他具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，敢于在指出其学术史意义的同时，客观地评价、质疑乃至否定已有的结论。而无论是激赏还是存疑，是褒扬还是批评，又都是建立在细致的文本解读、缜密的史料钩沉和有理有据的分析基础上的，秉持的是萧公权先生提出的“以学心读、以公心述、以平心取”的学术原则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比如，在论到谢冕主编的十卷本《中国新诗总系》时，松建一方面认为，原生态意义上的“文学史”就是经典、好诗、标志性本文和普通文本的混杂，《总系》中筛选出来的新诗把前三者的意义凸现出来，把纷繁的文学现象整合到一套完整、连贯的叙事结构中，构成了三个层次上的交错和并置，这方面的处理手法，兼顾历史与价值，是值得称道的。与此同时，松建也直言不讳地指出，《总系》把时间划分为“匀质性”（homogenous）的十年一代，这是方法论上的权宜之计，它预设了一个总体性的结构安排，借此呈现百年新诗的演变历程，给人以经典累积、好诗纷呈的繁荣局面，但也可能遮蔽了文学史的实际情况，有点化繁为简的味道。这个观点，在我看来，是站得住脚的，因为它有充分的学理依据，对于我们重构世界文学史，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松建激赏的是那种“将史料钩沉、文本细读、理论诠释融为一体，立意填补空白、增进知闻”的论著，质疑或反对的是“那种试图对文学进行思想史研究”、“很有可能使文学史降格为思想史脚注”的做法。另一方面，他也非常赞同萨义德提出的“回到语文学”的口号，重视那些看上去琐碎的版本、校勘之类的技术工作。在他看来，史料钩沉或文献学“牵扯的不但是字句段落的校订、不同版本的对勘或者佚文的整理这些琐碎的技术工作，而且囊括了互文篇目的追踪、作家生命史的回放、文坛情形的勾勒以及文学史的再审视”，不能不加以重视。这就涉



及道与术的辩证关系了。宏大的流行理论容易使人产生误解，以为它们纯然是不食文本烟火的形上之作。其实，综观中西学术史，学术之“道”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不起眼的“术”的进步而获得的。理论之光当然会照亮埋在尘灰中的文本，但反过来，第一手资料的缺乏往往也会限制理论视野的进一步扩展。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，我们缺乏的不是理论和符号，而是史料和洞见，因此，我完全同意松建的下述观点：

中国现代文学虽只有短暂的三十年，却造就了数之不尽的作家、作品、社团、流派、报纸副刊与文艺杂志，有幸进入“文学史”者只不过是冰山一角；所以，通过披沙沥金的文献功夫，挖掘一些学术界未曾得见的史料，也不算太大的难事。关键在于：如何不被浩如烟海的史料所淹没而清晰地彰显一己之判断？如何才能驱遣自如地利用史料、揭示出重大的问题从而有力地推动现有的研究？这就要求研究者具备淹博的“知识结构”、谨严的“学术识断”和开放的“文学趣味”。

这段话，虽然出自他对解氏论著的评述，但也代表了他本人的学术追求和定位。不知松建以为然否？

古人云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一乐也。虽然松建从我学艺不过三年，之后他又转了专业方向，但毕业后，他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我们经常互发邮件，探讨学术和人生问题。每有新作，也总会想到发送或寄赠对方先阅为快。我在与松建交往的过程中，切身感到了教学相长之乐。松建为人敦厚谦和，对学术志业一往情深。他的文心之缜密、史料钩沉之细心，文本解说之深入，常令我赞叹。这本新著的出版，我觉得是松建在学术道路上迈出的又一个阶梯。松建今年刚过不惑之年，已经出了三本专著、五十余篇论文，学术道路可谓通达宏阔。作为他的曾经的导师，我在为他自豪和欣喜之余，还是忍不住要唠叨几句，希望他在学术上日新又新，与时俱进。曾国藩曾云：“学贵初有坚定不

移之志，中有勇猛精进之心，末有坚贞永固之力。”愿借曾公此言与松建共勉。是为序。

张德明

2012年7月23日于杭州秋水苑寓所



序

目 录

上编 新马华文文学初探

国民性、个人主义与社会性别

- 新马华文作家对鲁迅经典的重写 (3)
- 引言 鲁迅与南洋 (3)
- 一 族裔、社会、国民性：“阿Q”的南洋子弟 (6)
- 二 异形的寓言：《獾，有此事》、食人主义
与退化论 (24)
- 三 阶级，还是性别？重读《再见惠兰的时候》 (30)
- 四 徘徊在个人与庸众之间：《梦呓集》中的自我
形象 (35)
- 五 探询“男性气质”：《一个像我这样的
男人》片论 (41)
- 结语 重写的后果 (52)

南洋风景、马华民族志与本土意识

- 王润华的雨林诗学及其他 (54)
- 引言 长河无尽流 (54)
- 一 南洋风物纪：离散书写与文化认同 (55)
- 二 国破，山河在：风景、集体记忆与本土意识 (63)
- 三 非抒情的声音：美学素质与修辞精髓 (76)
- 结语 把“世界”带回家 (85)

抒情现代主义的崛起

- 林方诗歌论 (88)
- 引言 边缘的缪斯 (88)



一 现代诗的追寻：修辞技艺与美学理念	(90)
二 重塑诗的肌质：从“戏剧主义”到“不纯诗”	(101)
三 通向文化政治：“自我”的形象与“乌托邦 感觉”	(109)
四 历史的暴政与专制性幻想	(114)
暗夜中的燃灯人	
——南子诗歌论	(120)
引言 艰难时代的诗人	(120)
一 从“少年情怀”到“中年心事”	(121)
二 诗学新秩序：反抒情主义的实践	(131)
三 诗艺的再创造：象征与形式	(143)
记忆书写的诗学与政治	
——希尼尔小说综论	(148)
引言 何谓“孤岛遗民”	(148)
一 历史记忆现象学：乡土、战争与文化	(150)
二 技巧与形式：从文体实验到修辞创新	(163)
三 族群与国家，本土与全球：文化政治的再检讨 ...	(170)
新加坡：文化与怀旧的政治	
——梁文福小说论	(178)
引言 怀旧的魅影	(178)
一 童年的消逝，成长的烦恼	(180)
二 现代性、新加坡与怀旧的风景	(189)
三 离散、全球化、后殖民与文化悲悼	(199)
四 怀旧的政治及其未来	(208)

下编 中国现代文学论衡

评秋吉久纪夫《缅甸战线上的穆旦——〈森林之魅〉的 主题》	(215)
解构本质主义与超越决定论	
——汪晖《反抗绝望》的学术史意义	(236)



现代主义新诗研究的先声	
——梁秉钧《对抗的美学》评议	(245)
现代主义及其文化政治	
——史书美《现代的诱惑》评介	(257)
王润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	
——一个批评回顾	(271)
边缘性、本土性与现代性	
——奚密的现代汉诗研究	(283)
一 “现代汉诗”:学术视野的拓展	(284)
二 “从边缘出发”:汉诗研究的新方向	(289)
三 “内在状况”:研究范式的转换	(294)
四 “四个同心圆”:方法论的更新	(300)
现代中国文学场的建构	
——贺麦晓《文体问题》阅读感言	(306)
历史暴力与文学想象	
——读王德威《历史与怪兽》	(319)
校读法、实存分析与文学史研究	
——解志熙《考文叙事录》述评	(326)
经典、好诗与文学史	
——关于《中国新诗总系》的选本问题	(335)
精进不息的开拓者	
——孙玉石的中国现代诗研究	(344)
理论的自觉与批评的睿智	
——吴思敬的中国新诗研究	(354)
后记	(363)

上 编

新马华文文学初探

国民性、个人主义与社会性别

——新马华文作家对鲁迅经典的重写

引言 鲁迅与南洋

“重写”乃是中外文学史上的一种常见现象，有时发生于民族文学的内部，有时超越了国家疆界而指向了比较文学的方向。与此相联系的是四个范畴：“前文本”、“重写文本”、“作者”、“写作语境”，这四个元素的交织和互动构成了重写的发生机制。重写文本与前文本之间存在一种类似于米勒所谓的“寄生”与“寄主”^①的关系，前文本既是重写文本存在的基础，又是后者力图予以消灭的东西。这种互文性在题材、主题、人物、情节、语言、文体等层面有所体现；而其间的差异性又揭示了重写者的主体性、理解水平、接受能力以及写作语境的制约。应该说，文学发生学意义上的模仿——不管是正面的模仿还是反面的戏仿——当然属于一种“重写”形式，它借助对原文本的挪借和改造而表达模仿者的写作意图。

鲁迅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开山，曾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（简称“新马华文文学”）产生过重要影响。1936年10月19日，鲁迅去世。《南洋商报》、《星洲日报》、《星中日报》第二天就发布了新闻报道，众多报章发起了隆重的悼念活动，纷纷出版“鲁迅纪念专号”，有照片、诗歌、木刻、散文、评论等

^① [美] 希利斯·米勒：《重申解构主义》，郭英剑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111—151页。



形式。从1936到50年代末期，新马华人的文化界共举行过五次规模浩大的纪念活动，单单在1937年10月19日，就有二十五个文艺团体参加了鲁迅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，当时的《星洲日报》、《光华日报》、《檳城新报》等报章登载了这方面的不少作品。进入60年代，每年的10月19日前后，仍有小规模、分散的鲁迅纪念活动。^①在五六十年的马来亚，左翼思潮蓬勃，学潮与工运此起彼伏，政党权力角逐趋向白热化，现实主义在马华文坛一支独大，在此形势下，鲁迅的影响尤为强势。例如，在丘康（张天白）心目中，鲁迅是“伟大的民族英雄”、“中国文坛之父”。文学史家方修把鲁迅誉为“青年导师”、“新中国的圣人”。在写于1967年9月的一篇文章里，左翼作家章翰（韩山元）以过来人的身份，回顾和总结了鲁迅对新马社会的影响——

鲁迅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、最深、最广的中国现代文学家。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、思想家，鲁迅对于马华文艺的影响，不仅是文艺创作，而且也遍及文艺路线、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的改造等各个方面。不仅是马华文学工作者深受鲁迅的影响，就是马华的美术、戏剧、音乐工作者，长期以来也深受鲁迅的影响。不仅是在文学艺术领域，就是在星马社会运动的各条战线，鲁迅的影响也是巨大和深远的。长期以来，确切地说，自鲁迅逝世后的四十年，鲁迅的高大形象，一直鼓舞着人民为正义的事业而奋斗。鲁迅一直是本地文艺工作者、知识分子学习的光辉典范。我们找不到第二个中国作家，在马来亚享有像鲁迅那样崇高的威信。^②

^① 参看章翰《鲁迅逝世在马华文艺界的反应》以及《马华文化界两次盛大的鲁迅纪念活动》，收入章翰《鲁迅与马华新文艺》，新加坡：风华出版社1977年版，第17—36、44—49页。

^② 章翰：《鲁迅对马华文艺的影响（1930—1948）》，收入《鲁迅与马华新文艺》，第1页。



此外，鲁迅的文学作品还不断被选入新马中小学的华文教科书，焕发着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以及世界性的多元声音。^① 进而言之，从20世纪20年代到21世纪，鲁迅经典是刺激新马华文作家之创造力的源头活水，他们不断从鲁迅那里寻获灵感，加以程度不等的转化与改写，各取所需，为我所用。我们至少可以举出如下数例。《阿Q正传》曾被丁翼、絮絮、吐虹、林万菁、李龙一再重写，云里风的《梦呓集》向鲁迅的《野草》致敬的痕迹一望而知，黄孟文的《再见惠兰的时候》在多方面受益于《故乡》的启示，英培安的《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》呼应着《伤逝》的思想主题而又推进了对本土问题的思考，瞿桓的《疯人日记》、姚紫的《新狂人日记》与梁文福的《獐，有此事》显而易见是对《狂人日记》的仿作和重写。不可避免的是，文本开放和重写之后，一系列问题于焉出现了：某个作家为何要对众所公认的经典进行重写？重写型文本与原文本的关系如何？重写者是如何看待原文本的，原文本的哪些因素激发了重写者的关注和兴趣？在重写这种文学形式的背后，有哪些个人、文化、政治的动机起着调节和斡旋的作用？有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“重写型”小说进行了翔实的研究，指出“重写型”小说的前文本可能是小说，也可能是经籍、史传、神话传说、词曲歌赋。^② 这殆无异议。本文考察新马华文文学中“重写”鲁迅经典的现象，涉及九位作家，^③ 时间跨度六十年，涵盖小说（包括微型、短篇、中篇和长篇）和散文诗两类。本文试图把重写这一现象给予不断的历史化，把相关的理论问题勾勒出来加以初步检讨，而不期望得出一个统一、最终的结论。

① 王润华：《新马华文教科书中的鲁迅作品》，北京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2012年第4期，第1—16页。

② 祝宇红：《“故”事如何“新”编：论中国现代“重写型”小说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6页。

③ 关于这些作家的传记，我主要依据下面的工具书——马仑：《新马华文作家群像》，新加坡：风云出版社1984年版；《新华作家传略》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、文艺协会1994年版；骆明主编：《新加坡华文作家传略》，新加坡文艺协会、作家协会、锡山文艺中心2005年版。



一 族裔、社会、国民性： “阿Q”的南洋子弟

鲁迅作品被南洋作家重写次数最多的，无疑是中篇小说《阿Q正传》。有论者考察过新马华文文学中的“阿Q形象”的衍变，但是流于现象罗列和情节复述，没有对相关作品的审美素质进行分析和判断，尤其是没有揭示关键性的理论课题，^①因此我觉得仍有重新研讨的必要。《阿Q正传》完成于1921年12月，此时距离“辛亥革命”的发生已整整十年，自1921年12月4日起至1922年2月12日止，连载于北平《晨报副刊》，署名“巴人”，后来收入鲁迅第一本小说集《呐喊》。^②在《阿Q正传》俄文译本序言中，鲁迅坦承其写作意图是“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”。^③在另一个场合，他表示自己坚守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立场：“所以我的取材，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。意思是在揭出病苦，引起疗救的注意。”^④如今，人们公认此篇集中全面地刻画了所谓“国民性”——其核心是由愚昧、麻木、自欺、健忘、奴隶性等负面因素构成的“精神胜利法”。经典之被“重写”以及重写文本的面貌如何，取决于作家的身世阅历、知识背景、人生观，他/她对原文本的理解水平和价值取向，他个人的创造能力，以及不可忽视的社会/文化语境的制约。众所周知，《阿Q正传》甫一问世，即出现形形色色的评论：或斥之为“浅薄的纪实的传记”，或不满其“病态”，或欣赏其“滑稽”，或强调其“讽刺和冷嘲”。那么，南洋作家是如何理解《阿Q正传》的？他们塑造的“阿Q”以何种面目示人？在我看来，国民

① 南治国：《旅行的阿Q——新马华文文学中的阿Q形象谈》，《华文文学》2003年第1期。

② 鲁迅：《阿Q正传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487—532页。

③ 鲁迅：《俄文译本〈阿Q正传〉序及著者自叙传略》，收入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8卷。

④ 鲁迅：《我怎么作起小说来》，收入《南腔北调集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4卷。